

1309

古田文史资料



1986³

GUTIAN WENSHI ZILIAO

(总第六辑)

《古田文史资料》第六辑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 爱国高僧——圆瑛法师.....县宗教局供稿 陈祖泽整理 (1)
- 中国植胶的创始人之一——钱仿周.....钱本鑫 (8)
- 1934年闽变蒋军进占古田经过.....陈长河 (13)
- 杉洋史略.....黄 钟 (27)
- 古田县地方道路的修建经过.....陈彬遗著 (41)
- 古田电力发展史的初探.....赵时万 (48)
- 平水轮船公司概况.....魏 莹 (51)
- 关于平水轮船公司若干情况的回忆.....魏 鹏 (53)
- 五十年代前期古田扫除文盲运动的一些回忆.....陈祖源 (57)
- 古田医院简史.....郑有雄 (59)
- 古田县气功研究会史.....刘景尧 (62)
- 我县妇科病普查普治的一些史料.....陈月娥 (64)
- 记谢哲性中医师.....陈灼铭 (67)
- 古田诗社拾零.....王远甫 (69)
- 古田书法史略.....赖 再 (81)
- 古田闽剧团的戏曲活动.....钟孟恭 (90)
- 蓝田书院旧日景观.....余理民 余祖祥 (95)
- 古田历史上的三部县志.....黄 钟 (98)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古田县委员会历届主席、副主席、
秘书长、常务委员、委员名单 陈光孝辑 (102)

爱国高僧——圆瑛法师

县宗教局供稿 陈祖泽整理

圆瑛法师系古田县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他1878年出生于古田平湖端上村，原名吴昌发，父母早丧，由其叔吴诗瑛抚养。幼读儒书，聪慧过人，感人生如幻，十七岁曾想出家，被其叔阻。十八岁大病后便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二十岁在该寺从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的开山祖师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其后出外参学，先后从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和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修习禅定，悟解超群，同时又从当时教下有名大德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诸法师，听讲经教多年，广泛涉猎大小乘诸经论，博览深究，对于《楞严经》的造诣尤深。解放前，曾七次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主席，十次担任国内外名山大刹的住持。解放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法师一生足迹遍及海内外如北京、天津、杭州、武汉、安徽、湖南、湖北、台湾、香港，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尼等地。他每到一地就讲经弘法，皈依弟子达数十万人。法师精通三藏，著作等身，已刊行的有《仁王般若经讲义》、《金刚般若经讲义》、《心经讲义》、《弥陀经讲义》以及《语录》、《演讲录》、《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廿余种编为《圆瑛法汇》出版，影响深远，不愧为当代高僧，佛教界之伟大领袖。兹就法师对佛教的贡献和爱国表现方面略作简单介绍：

法师毕生致力于佛教组织工作，早在1907年，寄禅和尚主持宁波僧教育会时，他就力加襄赞，多所擘画。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出席积极参加工作。1914年，

总会在北京成立时，他被选为参议长。1917年他担任宁波佛教协会会长。1928年，他被推为江浙佛教联合会会长。同年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圆召开，议决成立中国佛教会，这时才有全国教徒的统一组织。他先后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或理事长。解放后他又与赵朴初、巨赞、虚云、喜饶佳措、陈铭枢等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法师终生献身于我国佛教界的团结工作，获得了全国佛教徒的崇敬爱戴，同时也获得了国际佛教界人士的赞叹。日本佛教著名学者现任中日友好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佛教史上记载：“圆瑛法师在民国初期着手筹备中国佛教会，经公开选举由他担任会长，各省曾分设分支机构，直接开始进行多项活动，请求政府改正以寺庙办学的寺庙管理条例，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改为监督寺庙条例，清除了对寺庙的直接迫害”。

法师主张僧伽要振兴佛教，教化众生，首先自己要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他早在1909年初住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出许多人才。后来到南洋槟榔屿又创办了槟榔佛教研究会，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至今海内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有许多是毕业于这些学院的。

法师宗说兼通，行解相应，辩才无碍。一生演教讲经，法席遍于国内外。所讲经文，如楞严、法华、心经、金刚经弥陀疏钞、大乘起信论，性相通说，百法明门等，均深入浅出，博得听众的欢喜。讲经之处，常是座无虚席。

法师英年弘法，闻名于丛林，各地名山古刹，争相延致。他先后十次担任住持，如福州雪峰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福州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经他进山住持以后，都是规模一新，清规整肃，海众安和。他在天童寺曾提出

“十二不”条件对众宣誓：即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深为人们所赞许。一次当他住持天童寺时，有人不慎失火，天王殿等许多建筑俱遭焚毁，旁人认为很难修复，但法师信心极强，得到寺中两序大众和十方坛信的协力，很快修复起来并且较前尤为壮观。1929年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到雪峰寺访问，经过彼此诗偈的唱和，深感佩服，在其所著《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中，记述对法师的印象说：

“圆瑛和尚率徒七、八人为一团，随从和尚者概为青少年，我看他年一定会从此中涌现优秀的人物。和尚很有骨气，有豪杰之风，并富有统理大众的才干”。可见国际佛教学者对他是高度推许和敬仰的。

社会福利是弘法利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师除讲经说法外，尤重福利的施为。清末，他初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即创办僧民二校，僧校以教育出家青年，民校以教育贫家子弟。1918年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工读兼施，博得社会的好评。1923年在南洋讲经时，会遇星洲转道、巴生转物二和尚，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收容失父失母的孤儿。学科依照普通学校，衣、食、住医药则全部免费，以教以养，他亲自主持其事。1926年，他亲赴南洋募集慈儿院基金，使得维持发展，培养人才在数千以上。泉州开元东西二石塔为世界闻名建筑，海外侨胞视为泉州标志。他募化修复：由黄奕住先生独修东塔，黄秀琅先生独修西塔，并由黄仲训先生捐资，陆续修建开元寺大殿、甘露戒坛、法堂及山门等。1944年他又捐资在其家乡古田端上创办圆瑛小学，推行国民教育。

法师博通三藏，著作等身，已刊行者约廿余种，其中关于般若者有仁王般若，金刚般若，心经等讲义；关于净土者有弥陀经讲义弥陀经要解，普门品等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关于教理者有大乘起信论，法华经

弘传序，楞严经等讲义。此外还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及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

法师讲经说法，不但长于辩才，而处理事务尤举重若轻，有条不紊，一身常常同时负责数大丛林方丈职务，故被称为真正“法门龙象”。

其次法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早在1923年法师曾两度前往台湾宣化和探访，与台湾佛教界建立联系，表达了大陆佛门子弟对台湾同胞的关怀，促进了海峡两岸中华民族的团结。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法师义愤填膺，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北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芦沟桥事变，国难当头，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亲自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苏沪佛教青年僧侣救护队，以大慈大悲精神，积极进行救护工作。办理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难民和卫国受伤战士。

1937年10月为了筹集救灾经费，法师及其弟子明旻曾前往南洋各地发动募捐工作，先后到过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协同当地华侨商会组织“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他利用讲经机会，宣扬筹款救国，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踊跃捐献，支援救济事业。

1939年夏间，法师于视察各收容所及佛教医院后，又重赴南洋继续募捐。秋间回国抵沪不久，九月一日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他在大殿上供礼佛，突然来了日本宪兵队四辆汽车，载有宪兵数十人，包

围附近所有弄口，冲入讲堂，杀气腾腾，将他和明旻二人以抗日分子罪逮捕押上车，驰送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进行严刑拷打，并以手枪指其胸前说：“你怕不怕死呀！”企图迫使他们承认“抗日救国有罪”。坐牢一夜，备尝迫害之苦，次晨又将他俩师徒押解到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再度严刑审讯。他一心念佛平静如常，从容对付，理直气壮，坚持中国人民大无畏民族气节，并以绝食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经过一番激烈较量后，日本宪兵队长见法师威武不能屈，被迫转而劝诱法师与他合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法师以老病相辞。日本宪兵队无计可施，终于农历九月廿八日将师徒二人释放回沪。法师在这次魔劫中，面对强暴，临危不惧，这正是他爱国立场坚定的表现。

法师出狱后因身体衰弱，在上海医疗一个月又回圆明讲堂，这时又有日本僧人藤井草宣几次来请老人出任“中日佛教会长”，法师又毅然相辞。在此期间，法师一面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楞严经讲义，以应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纠缠；一面对国事未曾一日忘怀，他给北京中国佛学院师生赠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号召佛教青年要肩负“救国兴教”二付重担。其爱国热情与风格崇高，于兹可以想见。

全国解放前夕，上海人心紧张，不少香港、新加坡等地教友和弟子，纷纷函电并买好飞机票，催促法师飞往南洋，安度余生。他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为词，复信谢之，其爱国热忱又见诸行动有如是者。

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法师响应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号召，致函北京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郭沫若主席和彭真、陈叔通副主席表示拥护。信中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人类之福祉，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佛教的慈悲教义是爱好和平的，

尤其是佛教的大乘无我利他的精神，是争取和平，拯救和平，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和平会议的召开，其精神与重要性不但符合世界和平和人民的愿望，并且符合我们佛教的教义，我们佛教徒竭诚拥护。”九月八日法师与喜饶佳措等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进京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会议，并和参加会议的各国佛教徒发出联合声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作出一切努力。”在北京他还出席了佛教徒的欢迎会，会上他号召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他说：

“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伟大的和平运动，真是佛事！”他参加了和平会议以后，回到上海又参加圆明讲堂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对和平宣传起了一定的良好效果。

1953年夏，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民族，各宗教派，各地区的四众弟子代表120人，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空前的盛会。法师曾因病请假，仍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日本道瑞良秀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佛教史》上对他赞扬说：“解放初期，中国佛教界思想颇不安定，圆瑛法师为了统一团结佛教界，拥护政府，毅然出任第一届中国佛教会会长。虽然，圆瑛法师就任会长不久之后，便辞世西归，但其业绩与功勋却永远铭记在国内外佛教徒的心中。”

1953年秋，法师积劳成疾，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自知尘缘将尽，决计归老宁波天童寺，临行之前，写下遗嘱交赵朴初居士留待身后发表。原文如下：

“余一期将尽，力疾还山，身托祖庭，心栖净土，于兹长别，愿留数言：

一、社会道德，普遍提高，时节因缘，不可思议。凡我佛子，各宜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众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力，互助无争，团结第一。

二、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于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三、四大幻住，迁化随缘，身后安排，宜从简约。发计开吊，世俗所为，悉当免除，毋增罪咎。公元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圆瑛。”

法师回到天童以后，病情日益恶化，不幸于九月十九日（即农历八月十二日）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含笑，撒手西归，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当时各报纷纷报导圆寂情况和深致哀悼，认为是佛教界一大损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损失。赵朴初副会长在上海佛教界举行的追悼会上说：“九月十九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去年九月十九日圆瑛法师抱病晋京，为保卫和平事业奔走宣劳。今年九月十九日他示寂于天童与我们永别了。虽然他与我们的距离十万亿佛土，但是爱护祖国的热忱，保卫和平的真诚，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即微尘也不存在。”足见圆瑛法师的爱国护教精神影响之深了。

、（本文根据明旻法师《纪念先师圆瑛老法师生西三十周年》和从圆瑛家乡实地调查的材料而整理的）



中国植胶的创始人之一——钱仿周

钱 本 鑫

(一) 钱仿周的简历

钱仿周先生系古田县大桥镇钱厝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幼读乡塾，聪慧异常，其父爱之，授以中医医术，但督教太严，他不能忍受，便弃家逃往南平，就学于流芳小学。时民国初创，民生凋敝，古田农民南渡谋生者，日益众多。他于1922年随人渡海至北婆罗洲，落脚于诗巫地方，为人割树胶。不久移居泰国，经营杂货、药材生意，兼业行医，数年稍有积蓄，改营板厂，制炼牛奶，种植橡胶，逐渐成为当地开拓型的企业家。他身居海外，心怀祖国，为了发展祖国橡胶生产，曾于1947年筹组“暹华橡胶垦殖股份有限公司”，率领侨胞回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橄榄坝引种橡胶，初试成功，被任为该公司经理。全国解放后，1951年参加云南省农林厅滇西工作队，任过普洱区林业工作站，云南省垦殖局普洱分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热带作物试验场等单位技术员。他和李宗周二人被聘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委员等荣誉职。

1957年6月，因病体力不胜乃退职回到家乡，但仍散发余光，为家乡人民义务行医。文革开始，备受歧视，竟于1968年7月15日病逝于钱厝，终年六十四岁。

(二) 突破“植胶禁区”

钱仿周在西双版纳种植橡胶成功，突破了国际学术界的权威论断：“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限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赤道南北10度以内”。

钱仿周首先在西双版纳这个北纬 21° — 22° 之间的“植胶禁区”里向世界科学界的传统观点发起挑战，使我国云南省成为新崛起天然橡胶基地，全省橡胶种植业从西双版纳发源，种植范围扩展到北纬 25° ，海拔超过1200米。由于钱仿周等人的实践，使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中的橡胶树北移三千多公里，海拔提高1000米，为世界植胶史写出了光辉的篇章，使国际学术公认的权威著作《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在橡胶树生长界限问题上重新审定过去所做的结论。国际学术界也将因为他们的伟大首创，而进行一系列新的研究工作。

（三）赤子雄心，回国种胶

钱仿周早在砂罗越泰国等地种植橡胶，掌握了一套种胶技术。橡胶祖国多么需要！祖国这么大的土地，什么地方可以种树产胶？他多么希望祖国强大，他立志要为祖国多做贡献。早在一九三八年，他由陆路爬山涉水经过缅甸回到云南车里县（现景洪县）。在橄榄坝猛宽逗留二十余天，详细考察该地方的土壤、气候、作物生长情况。时值隆冬腊月气温最低的时候，该地春季作物如南瓜、丝瓜犹藤蔓篱边；热带作物如椰子、槟榔老叶、片肚子果、芒果等一片生机；江边沙滩上老百姓种的花生，茁壮蓬勃他认定该地方适合种植橡胶。回泰国之后，他将在橄榄坝考察情况告诉有志于回祖国投资种胶的侨胞。经过大家商量，1939年春，钱仿周便带领叶南路、阜同泰来橄榄坝开办苗圃准备种胶，途经缅甸猛勇时，钱仿周被缅甸军怀疑是日本间谍被扣留，经交涉，三个月后才释放。1939年秋钱仿周又带领钱长琛、陈团隆押运50万株橡胶种子回橄榄坝。当时交通落后，公路未通，用马驮种子时间耽误太久使种子霉烂，种后不能发芽。初次育苗失败没有使他灰心，再度回泰研究胶苗远运，保存不坏的方法。经过一年的试验，终获成功。钱仿周信心倍增，遂出售在泰国的部份财产，得款汇回昆明中国银行存备回橄榄

坝种胶之用。但时值日军南进，他的计划，暂作罢论。直到一九四七年他才派人带1000余株胶苗回橄榄坝试种，种在当时的橄榄坝乡公所内。一九四八年四月钱仿周又亲临橄榄坝察看试种结果，发现长势很好，于是决定立即返泰，备苗回国种胶。

（四）“暹华橡胶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种胶经过

一九四八年四月，钱仿周由橄榄坝回泰首先向有志于回祖国投资的侨胞（基本上都是古田籍侨胞）宣传回国种胶事宜；随之，由钱仿周、林家昌、姚福美、杨泽叔、李祖清、刘祖隆、林政用、陈春宅、郑开务、吴泗川、李细章发起组织“暹华橡胶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发动众多的古田籍侨胞参加认股；随之，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制定章程选举办事人员。决定公司董事部由钱仿周、林家昌、林政用、吴泗川、郑开务、李祖清、刘祖隆、杨泽叔、李细章、叶国齐、陈春宅、姚福美等人组成。委派钱仿周、姚福美、吴德标、李宗周、程金昌、林冬兰、郑开廷回橄榄坝进行种植工作。由钱仿周任总经理，姚福美任监察及林场工作计划主任。吴德标任财务，李宗周为保管。

公司招收股份陆百股，每股500铢泰币，共收三十万泰币。并限额最多六十股，最少一股。其中股份最多的是钱仿周，张贤师，林家昌、姚福美、吴泗川等人。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钱仿周带领姚福美、吴德标、李宗周、林冬兰、郑开廷和二万株胶苗，由泰国洛坤府孔曾里起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八月廿三日到达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即原车里县）橄榄坝。第二天，就在祖国的土地上——橄榄坝土名叫蛮轮的地方，雇工种下了第一批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橡胶树。这年冬又在土名叫回轮的地方开荒千余亩，准备继续下种。

胶苗种下去后，遭到意外的灾难，七千棵的苗木，几天内就被当地

牛群糟踏光了，但海外赤子们种胶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们把带回剩下的苗木13000棵胶种到远离寨子的山坡上，买来大量的竹子在胶园周围围上竹篱。一九四九年初，钱仿周再度赴泰运苗，六月苗运至缅甸景栋，因种种原因，无法直接运到橄榄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寄种在景栋韩江波菜园内。九月钱仿周和金昌一道绕道缅甸猛勇，偷偷回到橄榄坝探查情况。这时当全国解放，云南边陲情况复杂，暹华公司受到车里，橄榄坝行政当局打击，回轮开荒之地亦无法下种。边境旧军队残余和地方势力仍未消除，造谣破坏，威胁说“共产党要杀资本家”“没收胶园”等迫使暹华公司人员姚福美、吴德标、郑开廷、林冬兰等逃回泰国。但钱仿周、李宗周、程金昌爱国心切，坚持在橄榄坝种胶不走。一九五〇年初，钱仿周等人又在回轮重整土地围篱。四月钱仿周再度赴缅甸景栋运苗，发觉前年寄种在韩江波菜园里的新苗太幼，运回下种恐成活率低，又返回泰国运苗，由于当时解放初期，情况复杂，股东们看到屡遭打击，有所顾虑，他即决定宁可成活率低些，将景栋的胶苗运回先种。不料当他折回景栋时正迁当地戒严，他被关押，科以“违法入境”处一年徒刑，后经朋友保释在外候讯，至同年十二月才获准出境。时值旱季，胶苗无法运回来，只好将在蛮轮的苗木剩下6000余株搬到回轮下种。1951年又全面整地、锄草准备五月出景栋运苗，但未获批准出境。一九五二年三月这个胶园交给云南省垦殖局普洱分局接管。

一九五三年，胶园的胶树都已茁壮成林，部分胶树可以开割产胶了。出乎意料，一次山林大火竟把胶园烧光，一万株胶树只剩下李宗周屋前的一小片76株胶树。他们见状心痛不已，望着劫后余胶，免不住伤心落泪。然而钱仿周说：“就是只剩一株了，也要保护好，后人会发展的”。他们化伤痛为力量，重振旗鼓，继续作战。

这时，中央派来一位同志，召集开会，讨论种胶的事。他说：“国

家多么需要橡胶，可是美国封锁我们，不卖给；有的国家要我们用大米进行不等价的交换。同志们我们自己种吧，橄榄坝不是有人种成功了吗？”

这些话给钱仿周、李宗周他们无异打了兴奋剂。振奋起来为发展新中国种胶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赴滇西，下海南、蹲景洪……他们做了大量植胶工作。

就这样，他们在橄榄坝把用心血浇灌结成的果实，作为向祖国的献礼。

（五）伟大的首创，崇高的荣誉

钱仿周先生当年在西双版纳辛勤劳动，已经结出了丰硕之果。如今西双版纳大面积种植橡胶已获成功。并扩展到七个地州，二十多个县。使云南省成为我国新崛起的天然橡胶基地。当一九八一年五月我国专家在泰国宋卡府举行的国际橡胶学术讨论会上郑重宣布这个不可思议的消息后，在西双版纳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植胶专家。考察结果，联合国橡胶专家保罗先生称赞：“你们的橡胶培育是世界第一流的，你们的胶园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胶园相媲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参观后兴奋地说：“你们为东南亚国家开发北部资源，扩大橡胶种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我们少花了十年摸索时间。”钱仿周先生的实践，誉满全世界。

云南人民给了钱仿周、李宗周等人崇高的荣誉，对他们的事迹做了突出的报导。《云南日报》在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的专稿中把钱仿周、李宗周与云南省杰出的少数民族领袖并提，称之“爱国志士”誉为“西双版纳橡胶之父”。

（本文根据钱仿周生前的笔记并参考福建日报一九八五年四月廿四日刊登的《西双版纳橡胶之父》一文整理写成的）

1934年闽变蒋军进占古田经过

陈 长 河

1933年冬，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抗日反蒋人士李济深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发动震撼中外的福建事变，公开同南京蒋介石政府决裂。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陆海空军准备对福建人民政府发起军事进攻。这年年底，对闽军事行动开始，由总指挥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率第二、第四、第五路军，由赣东、浙西分道入闽，向延平（今南平）、水口、古田等地进犯。1934年1月5日延平陷落，7日水口失守，古田也于12日被占。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蒋军攻占古田经过略作介绍，供史学界参考。

一、战前“攻守”双方态势

第十九路军第五军第九师师长赵一肩，于1933年12月初，奉令率兵三团入守古田，以阻止蒋军进攻。两旬以来，守军积极修葺城垣，增筑掩体，并选择城外附近各高地，构筑坚固防御工事。一面积弹屯粮，“弹药均准备充实”，“给养足供三个月^①”，以图久守。

蒋介石决定以张治中第四路军所属王敬久第二纵队之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兼）、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负围攻古田之责，以古田乃战略要地直接威胁福州。该纵队奉令后，于12月26日开始运动，先后自建瓯附近出发，第八十七师进出于玉山街、迪口以东地区，第八十八师则由小桥、上堡向前推进。各部到达玉山街后，仍按预定计划进展。第八十七师向筹岭前进，于31日（称1月1日）晚进占古田西北王柏口，驱逐当地守兵。第八十八师则分为两队出发，第二六二旅

(欠第五二三团)经筹岭、古镇、西溪,第二六四旅经严下、中田、九都桥,于2日晚进抵上乾、五都、凤埔一带。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是,欲诱第十九路军主力离开古田进援王柏口,以达到其一网打尽的目的。乃决定对古田不予急攻,先行夺占附近各要点,以形成合围监视态势。

二、古田城的地形特点与第十九路军的兵力配备

古田位于群山环抱之中,此时居民达三万余人,为闽北繁盛的县城之一。其四周筑有城墙,作长方形,南北长而东西狭,高约丈余。其东北绕以曲水(古洋河,今称古田溪),深约一米,水流湍急。北门外有紫桥一座,长约十余丈。西北有黄竹签山,横跨城之内、外,部分城墙筑于山麓之上。东门外有东门头山及船头山,绵亘起伏,与黄竹签山遥相对峙,形势颇为险要。黄竹签山以西地区,自北而南,有天王山、利洋山、南山、明府山、高头岭等山,矗立云表,瞰制各方。城北有架椅山,东连旸谷山,西倚天王山,为古田城北屏障。该城西北可通建瓯,东南直达福州,北接屏南、政和,南连江边水口,西南又有公路至谷口。诚然,古田有失,则难于立足闽江流域。故其得失,关系战局,至为重大。

古田原驻第十九路军三团(赵一肩两团,陈任之一团),拥七五山炮两门。后于1月3日,又由谷口开来补充师第三团。其主力分布于过溪山、架椅山、黄竹签山一带及古田城内。其警戒部队则远布于王柏口、明府山及廷元里山一带。在古(田)谷(口)公路沿途,还派有便衣队约一团,散布于附近各山中,负保护古谷间交通。据称:“古田北至王柏口,有其营哨;平湖街,有其连哨;一保以北,有其排哨;其东门外李家村,有其连哨;东北羊角附近,有其连哨。”其中,“平湖街有简单工事,王柏口与古田工事坚强,古田四周并有电网。”②

三、蒋军进占古田附近阵地

（一）第八十七师攻占明府山、架椅山

1月1日午前，该师前卫第二六一旅（旅长刘安祺），于占领王柏口后，即派第五二二团（团长易安华）续攻天王山、利洋山、南山一带阵地。其余则置于王柏口苏墩之间，籍资策应。同时，该旅又派出一部进至利洋、后寨间，协同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二团，进攻明府山、高头岭一带阵地。蒋军自是日午后一时起发起攻击，守军居高临下，予来犯之敌以狙击，“顽强抵抗”。^③但终以兵力众寡悬殊，至傍晚，守军被迫退入古田城内，蒋军遂加以占领。师长王敬久，鉴于各部均已进入预定地区，乃于2日下达攻击准备命令。其要点为：（一）第二五九旅（旅长沈发藻）派驻平沙一连兵力，进驻上乾附近警戒。其余仍置于利洋、后寨、凤埔一带待命。（二）第二六一旅以一部占领天王山至明府山一带高地，继续警戒。其余仍置于王柏口、苏墩间待命。（三）山炮第三营及各部榴弹炮、小炮，于3日八时，由旅长刘安祺带往侦察炮兵阵地。测量对方主阵地距离，并开辟炮兵进入途径。（四）工兵营以一部协助山炮营构筑阵地，其余自3日七时起，开始构筑由凤埔经平沙、过本山至后寨及苏墩通利洋道路。

1月4日，师长王敬久为便于后方各部运输及前方发动攻击起见，拟先派部队将妨害最大的架椅山据点，予以占领。即于是日午后九时，令王柏口第二六一旅炮兵一营，于5日拂晓前占领该山。该旅奉令后，即派第二营（欠第五连）并配以留弹加农炮，承担任务。为防守军抵抗，加派第三营（欠第八连）置于旻谷山北麓，以资策应。第二营以第六连充前锋，第四连为预备队，机枪、小炮同时进入阵地。该营对一时许开始发动进攻。前锋进至架椅山时，以该山高峻，且无荫蔽之处，而守军约一营（补充师第三团第三营），居高临下，“据守数线之一连式坚固散兵壕，又配以多量之自动火器。”^④欲加夺取，颇不容易。该营